



【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】

法律不是皇帝,牙防组不是功臣

在我印象中,好像还没有哪个机构像牙防组那样,因违法乱纪而被舆论穷追猛打了如此漫长的时间。尽管牙防组于2007年4月30日已寿终正寝,但至今它还处在万众口水的中心。因此,假如有人说牙防组的问题不是个大问题,大家肯定是不同意的;卫生部疾控局称牙防组成绩大于问题,也注定是要挨批的。

6月19日的《京华时报》报道说,牙防组的专家们坚持认为,比起牙防组做过的很多事情,违规认证只算是个“小问题”。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则称:“牙防组成绩是第一位的,问题是第二位的。”一群牙防组的专家与他们的上级,把牙防研讨会开成“表扬会”,自己给自己打分,难免让人感到几分滑稽。

众多牙防专家引以为傲的成绩主要是什么呢?根据他们

的总结,主要是:一,倡导成立了每年9月20日的爱牙日;二,组织了两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。假如这两件事真算得上很大的成绩,那么我就很难搞清楚,牙防组从头到底是一个以帮群众护牙为职责的机构,还是一个专业的牙膏认证机构。假如是后者,那么牙防组的确为人民群众做出了贡献。但有关部门已经宣布:牙防组的认证是违规的,牙防基金的财务是混乱的。这就意味着,做好牙防工作才是牙防组的本职所在,不能算作功劳,否则牙防组就没必要存在了。

通过这个会议,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舆论要对牙防组的问题穷追不舍了:直到现在,牙防组的专家与他们的直接上司对反省过错显得很不情愿,缺乏悔意。毫无疑问,众专家与他的上级此番“功大于过”的言论,是一种“消减

过错”的努力。牙防组问题如此引人注目,当然得有人承担责任。6月11日,卫生部发言人曾指出,因监督不力,个别司局必须承担责任。虽然发言人没点名,但基本上跟点名差不多。

“功过相抵”、“将功赎罪”是过去封建王朝的法治习惯,每每有朝廷官员犯下重罪,总是有其他同僚向皇帝求情,诉说着罪臣的功劳。在现代法治社会,法律不是皇帝,不可能将法规条文当成可随意改变的东西。因此,在法规面前把功与过拿出来排名,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——“功”是工作职责的表现,“过”则是法纪问题,二者没有必然联系,自然也不可能存在“功劳第一过错第二”的排名根据。这就好比一个贪官,他为人民当公仆一辈子,在本职工作上尽职尽责,只因“晚

节不保”而受到追究,这时候法律显然不可能将他的过错视为“第二”因素而宽恕他。套用卫生部一位官员的话说:“让他当官的时候,谁想到他会成为贪官呢?”

法律面前,没有小问题;在人民健康问题上,同样没有小过错。拿牙膏认证来说,牙防组不仅超越了卫生部的授权,而且公然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,损伤了至高无上的法制尊严;收受认证费用,向牙膏厂商出售牙防“标签”,而那些曾获得认证的牙膏,就有品牌被一些国家与地区列为“禁售”或“有问题”的行列。

事关法治尊严与人民身体健康,牙防组的“功过论”显然是有害的理论。

(作者椿桦系资深时事评论员,有时事评论集《舆论尖刀》问世)

章子怡爱不爱国谁说了算?

■今日视点

章子怡因“要去美国拍戏和为京剧《梅兰芳》培训”等原因,表示无法出席上海电影节。上海市吴老太获悉后,指责章子怡不爱国。

(6月20日《新民网》)

继刘德华被《同一首歌》指责为不爱“英雄母亲”之后,章子怡又被指“不爱国”。有“爱国”在后面撑腰,老太太的火气不可谓不大、用词不可谓不尖酸刻薄。本人无意轻视吴老太的爱国之心,但问题是,既然章子怡如此不堪,你该指责的就应该是上海电影节“不自重”,而不是章子怡“不爱国”。遵循着同样的逻辑,如果章子怡莅临电影节现场,吴老太应该去现场抗议才对,而不是被她的“无法出席”所激怒。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?

持中而论,章子怡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姑娘。

魏明伦对她的评价是“万世师表比不上一个尤物”,话虽然说得过头,但意思大体不错。因章子怡,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于润物细无声中在世界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,大家有目共睹。如果说“爱国”,章子怡美丽的中国脸庞本身就是爱国的。她在世界上每一个重大场合的翩然亮相,都是在替中国人争脸面,都是爱国的一部分。

“爱国”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洞之物。换言之,它是靠内容来填充的,而不是拿来当旗帜的。所以,我服膺一句话,可怕的不是罪恶,而是对罪恶的命名。毁誉忠奸,全凭你嘴唇之间,由此成就了一场“只赚不赔”的买卖:说别人“不爱国”,则意味着自己“爱国”,不管最后怎样,自己“爱国”的名声算是板上钉钉了。说不定还会因感觉自己如此“爱国”,感动得掉下泪来,不知吴老太有没有?(张若渔)

“职业考生”是应试教育的棋子

■热点纵论

四川广安考生张非2003年考入北大,次年退学返乡,被一所民办学校挖去,代表该校参加2005年高考,结果考上清华,获得10万元重奖。之后,张非又退学,以南充另一所民办学校学生的身份参加今年高考,估分高达680多分,又将轻松获取重奖。

(6月20日《华西都市报》)

如果摒弃情绪性的发泄,从制度层面打量“职业高考生”,张非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:其一,目前有关高考的政策措施,并没有规定从大学退学后的考生不得再参加高考,也没有限制次数。其二,张非高考时没有作弊,也没有替考,其成绩是真实可靠的。其三,高考奖金是学校自愿给张非的,即使他真把高考当赚钱工具,那也属“劳动所得”。(修仰峰)

我们真正要问的是:谁制造“职业高考生”?

“职业高考生”的背后,是一条日益严密的“高考产业化”的生成链条:某地出现高考状元,对老师来说,荣誉之外,是奖金、职称、职务、住房等实惠的表现;对学校来说,无疑是金字招牌,并据此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;对地方教育部门来说,自然可以借高考状元彰显教育政绩。

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,这条利益链日趋严密,为了利益最大化,自然要不停寻找“代理人”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职业高考生”和替考者一样,都是一颗棋子。他们虽然获得了一点可怜的利益,但一旦事发,受舆论谴责的往往也是他们。应试教育不改,躲在其后的那条越来越畸形的利益链不斩断,就还会繁衍出“职业高考生”的新变种。(修仰峰)

关于领取南湾康居城宁康苑《入住通知书》的通告

玄武区前湖、韦陀巷片区拆迁户:

栖霞区马群老街南片、马群老街北片、西气东输项目马群段、中山陵环境整治项目、绕城公路项目拆迁户:

徐州市鼓楼区马群街道办事处(原南湖)、经济开发区项目拆迁户:

徐州市鼓楼区马群街道办事处(原南湖)、经济开发区项目拆迁户: